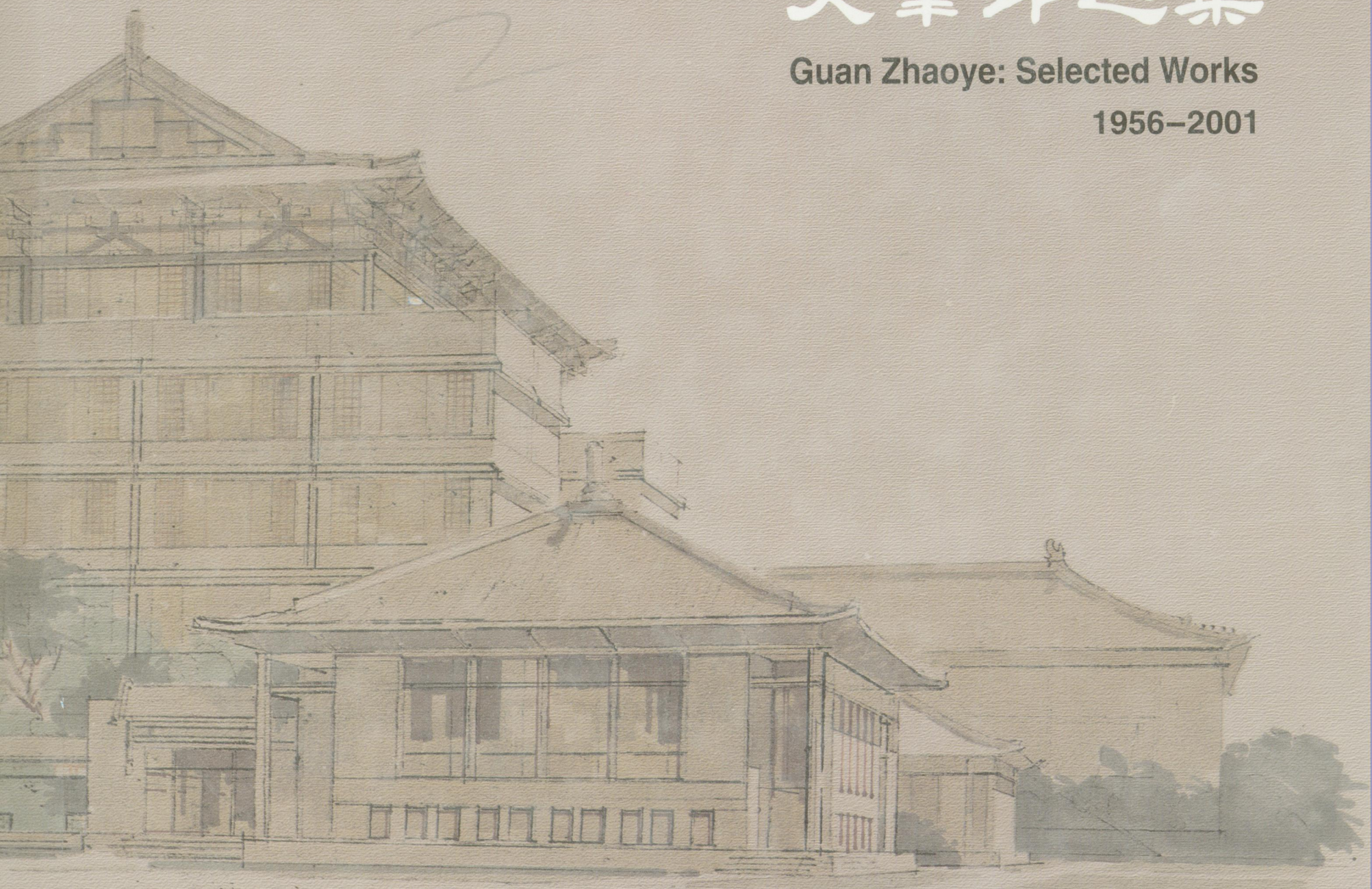


关肇邨选集

Guan Zhaoye: Selected Works

1956-2001



清华大学出版社

TU206

36

关肇邨选集

Guan Zhaoye : Selected Works
1956—2001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19712

关肇邨选集

Guan Zhaoye : Selected Works
1956—2001

(京)新登字15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肇邨选集/关肇邨著.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4

ISBN 7-302-05377-4

I.关... II.关... III.建筑设计-文集IV.TU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8977号

书 名: 关肇邨选集 1956—2001

作 者: 关肇邨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编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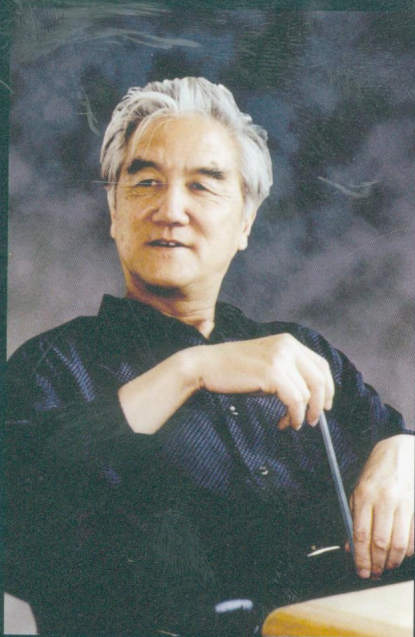
开 本: 787×1092 1/12 印张: 24

版 次: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302-05377-4/TU·174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198.00元



关肇邨

1929年10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南海。

1947至1948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理学院，1948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1952年至今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1981至1982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作。

1984年晋升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首届“梁思成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关肇邨

目 录

序	6
自叙	8
清华大学主楼	18
地铁东四十条站建筑	32
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	34
尊重历史，尊重环境，为今人服务，为先贤增辉	58
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	62
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	66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70
从“假古董”谈到“创新”	75
积极的城市建设	80
从伦敦看北京	84
再从伦敦看北京——兼谈“夺回古都风貌”	92
海南大学(图书馆及电教楼)建筑	100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114
努力做到更好的建筑自明性	124
建筑艺术浅谈	127
建筑慎言“创新”	130
北京大学图书馆	136
百年书城 一系文脉	168
清华大学理学院	172
大学校园中的围合空间——兼记清华大学理学院设计	198
徐州博物馆	204
清华大学博物馆	218
亚历山大图书馆方案	226
天安门广场空间环境优化研究	232
作品年表	273
图片来源	284

《关肇邨选集》书将成，嘱序于余。关先生以其设计创作与学术上的成就，被选为工程院院士，获得建筑大师称号，荣膺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这些都是对他成就的认可。集内作品简练，论文语颇精辟，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里只是提出几件往事，或许有助于大家进一步了解关先生。

他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二届学生，在毕业之前，其才华即已为梁思成先生所赏识，梁先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中，曾找他帮助画一些图。1952年毕业，他原被分配到东北某大学执教，因他帮梁先生画图为由，与教育部多番联系，把他留了下来。数十年来，他通过参加国庆工程、主持清华主楼设计等，学术上不断得到发展，我为他才华出众、脱颖而出颇感慰藉。

在关先生的创作生涯中，清华大学图书馆设计是很关键的。文革之后，刘达校长主持校务，嘱我一度管学校基建与规划，当时即有扩建图书馆之议，对修建的具体意见分歧很大，主持馆务者希望在主楼后另建新馆（即现在体育馆的位置），有些同志认为宜在老馆上接

出来。我曾邀请旧馆设计人杨廷宝老师来清华看一看，他也建议在老馆基础上发展，不要另建。但究竟如何接，又议论未定。从图书馆设计、建设的过程来看，我觉得现在关先生的这个方案的解决方式和所取得的效果是成功的，得到这样的结果很不容易。如果说我有什么意见，就是在图书馆入口前本来有一些大树，如果择其姿态较好者保留一些，使新馆与大礼堂之间多一个空间层次，可能更好，当然这已属细节了。但惟其是“细节”，每为人所忽略，如能做好，则是更增加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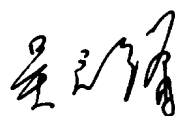
还有北大图书馆的设计。早在1952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建委会之时，当时北大工学院某位教授所从事的北大新校园规划朝东发展，并为主事者所肯定；我曾接手当时的规划，北京城市规划的总图尚未定，但南北中轴线是肯定会有有的，我就与当时北京市规划局工作同志共同商讨，定下南入口位置以及正对北大东入口的这条路的中心线，在规划上拟定将图书馆建筑作为东大门的主体建筑。1958年在陆平校长主持下，进行北大规划方案征集，我亦曾参与其

事，东入口之方案未变。文革后能在拟定的地址上将图书馆盖出来很不容易。所以，对北大新扩建图书馆设计，我一直希望进一步努力成为东入口的标志性建筑。关先生的这个方案被通过后，我很高兴。他大胆采用大屋顶，这是东区标志性建筑，又是新旧建筑群即未名湖区建筑群，与南门中轴线过渡的核心，成败关系甚大。新楼添建的成功，使我多年的担心得以释怀。可惜的是，当时因否定东入口而建造的地学楼，位置过偏，不成格局。在祝贺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成功的同时，希望今后对东入口新建筑群的形成结合东入口再做一番努力。根据我的认识，面对苛刻艰难的设计条件，只要有心人认真努力，有时不仅可以迎刃而解，甚至成为佳作。

对上述两个建筑的设计，我深有感叹。第一，这两个建筑都处于关键部位，都是一个历时很长的难题，关先生以其自己的理论，从整体格局着眼，努力创造他所说的“积极的城市建筑”，追求得体，而不是豪华与新奇，其结果往往成为所在地段的核心建筑，其理论平易而作品非凡。相反，如果自作主

张，矫揉造作，则可能适得其反。这是关先生建筑思想和设计技术的高人之处。第二，一个好的设计取得成功，往往好事多磨，涉及的环节太多，偶然性亦太多，甚至一个美好的设计已进入建设的最后阶段，也会功败垂成。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两个关键工作做好，就可以臻得设计的成功：一是题目要出好，指导原则要正确；二是要委托高水平的建筑师，并给予一定的信任，最怕反其道而行，而在现实生活中，与其相悖的做法不胜枚举，故虽建设如雨后春笋，而佳作难得。分析上述两座建筑之成功，关键亦在此。

谨此为序。



2001年4月10日于剑桥大学

近些年来常有一些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最怕的是他们要你谈谈或写写“成才之路”一类的话，自然是针对青年学生的。因为这种文字无非是希望你以自己的体会证明“成就”是“一分天资加九分勤奋”，而我却是既无天资又最不勤奋；或是希望你能喊出“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之句，这可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而我虽是过了退休年龄还在干，不过是按规定没有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我自知实在谈不上有多大成就。作为教师，近50年来当然有不少学生，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和东西各国，倒真是遍及天下的桃李，这该称是主要的成绩。当然，结合教学工作，我也主持或指导了一些建筑设计，并写过一些表明自己设计观点和理念的文字。现在新世纪开始了，又值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经有关方面的建议和督促，把一些建筑设计和文章选编成册，算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的一个回顾吧。

建筑是遗憾的艺术。每项设计建成了，总会留下许多无法弥补的缺憾。这样一本选集，就是一个集大成的总遗

憾。当然也可看成是对将来工作的一个鞭策。对青年读者来说，则是一面可以借鉴、有经验、有教训的镜子。为此，我亦对自己的过去做一些剖析，或可对读者起到更好的借鉴作用。

我父亲是清末甲辰进士，年龄长我近50岁，我是他最小的儿子。他的各方面似乎都离我们兄弟姐妹太远了，所以思想交谈也不多。但是在以他为主的家里，那强烈的、传统的、大部分是封建文化的环境和气氛，无论是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都不能不对我们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在以后也就自然地影响了我的建筑观的某些方面。

以物质环境来说，我从出生至读高中这段年代，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一座四合院式住宅中度过的。它位于南池子南口的一条胡同内，与东长安街的直线距离，不过百米。其中有不少院落和庭园。我幼时身体瘦弱，不喜欢活动。有段时间家里派人带着，每天或隔日到中山公园散步（我父亲作为董事，有一张不限时间人数的游园票）。由我家到中山公园有两条方便的路：一是出南池子拱门而西，穿过长安左门（后来拆除

的“三座门”），沿天安门前金水河走进公园的南门；二是先由南池子的中部进入太庙，穿过松柏林，经午门前的两座阙门而进入公园的后门。无论走哪条路，伟大的建筑艺术的震撼力，都会给我的思想刻上深刻的印记。犹如小孩子背古文和诗词，读时不懂，但能记得住，年长以后才逐渐了解它的含意并感受其艺术的熏陶。这些潜在的感受对以后我之建筑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

父亲的老同事、留法归来娶了法国太太的老工程师华南圭先生（华揽洪先生之父）常来家作客。他认为我家的房子按欧洲的标准衡量太不实用，就帮我家把这四合院的一些部分做了改造：把前院的一处九间“勾连搭”房中的两排柱子取消，换了大跨结构，成为一个无阻碍的大厅；我们生活常用的后院的一圈抄手游廊则全安上了玻璃隔断，使冬天不必出户而来往于正房厢房之间，并且安装了两套新式的卫生间。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都是很少见的。抗战期间，我家原拟南迁不成而留在敌占区。父亲坚持不做敌伪的事而没了经济来源，就靠出租住房来维持一家生计。

这就需要把住宅隔成几个区，每区自成格局，有大门、院子、前厅、住房和厨房卫生间等。以最少的工程量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实际是个非常有趣的联系实际的建筑设计课题。一般由母亲操持，我们兄弟姐妹丈量画图，直到找到房客将房子顺利租出去，我们也就乐在其中，对建筑与生活的关系，开始有了初步体会。

在抗战前一年，我随父母到南京去读书，住在南京政府铁道部新建的院内。住宅是讲究的新式楼房，和相邻的办公大楼一样，洋楼上有琉璃瓦的大屋顶。铁道部和交通部隔着中山北路相对，都是巍峨壮观的复古式大厦。这段时间也看到不少当时“首都计划”中的许多“宫殿式”建筑，包括中山陵。这些都对一直住在北平未见过洋房的我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

在我小学毕业之前的一个冬天，家里进行照例的“扫除”时，我在平时不去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只尘封多年、形状古怪的箱子，箱盖隆起，有铁皮加固，只在电影中海盗船上才见过的那种。我父亲曾在1905年受清廷派遣随“两大

臣”有过一次出使九国考察政治的环球旅行，这是他带回的部分东西，箱中装满了近百本图册，都是欧美各大都市的城市建筑图景。它们画幅很大，装帧精美，其中所显示的都市风光、宫室建筑令我大感兴趣，以后我便常去翻看，从而得知世界上竟有这么多壮观精美的建筑，玉笋般的米兰大教堂、气派的凡尔赛镜殿、歌剧院的大扶梯、维也纳的夏宫以及“市加谷”的高楼等等，无不令我叹为观止，感到不可思议。我又喜欢对照地图了解这些形象所在位置而依次神游其中。以后经过多次沧桑变故，这些图册均未能保存下来，但它们对我至今犹有很深的印象。近十多年我几次出访欧美诸国，我对某些城市街道广场建筑的了解，常可胜任同行者和导游，令他们误以为我已来过了，其实我也是初次。人们往往是先由图片上初步认知那些著名建筑，但那是二维、静态的，及至有一天真的身临其境，有了全方位的动态的表里兼及的观察，这时印证了又纠正了许多自己原来的认识，既熟悉又陌生，笼罩在强烈的建筑空间的氛围之中，那种难以言传的快感，才真激动人

心。在后来我初到拉萨，经过8天路上翻山越岭的旅程，绕过最后一道山口而突然看到在夕阳照耀下布达拉宫那群金光闪烁的屋顶时，就产生了这种难以名状的快感，为此我在一篇短文《天外云一香》中便谈到了这种感受。在以后凡有机会亲自面对名建筑时，总会感到这种特别的享受。

在解放之初的许多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于自己的家庭出身总以为是充满了消极影响，以后逐渐感到应当一分为二。今天则看到幼年时所接受的影响中，积极成分还是不少的。在决定学习建筑专业以后的初期，更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的启蒙教育，令我对建筑深感兴趣并得以逐渐步入其堂奥，窥见建筑学这一百花园中的“宫室之美、百官之富”。两位先生的言传身教中最富于感染力的当属他们对建筑文化无比的真挚情感和广博学识。我在《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为纪念梁先生85年诞辰而作）一文中有所叙及。这里再补述二例。初上大学，梁先生在和新生见面时有过一次谈话。除去一般地讲了建筑学是什么以及如何学等之后，

有一段话给我印象最深。大意是，祝贺你们选择了建筑学，学建筑的人非常幸福，他较别人有更多发生兴趣和精神享受的机会。在夕阳下的颓壁残垣、断碑古井旁，别人感到了无兴趣的地方，他却能在其中看到极美。有许多事物可以研究思考，引起无穷的遐想、陶醉于其中而流连不能离去……。又有一次梁先生与我们谈到专与博的问题，说明二者不可偏，并以他自己为“戒”谈到，

“我自己就太杂了，什么都有兴趣，都花了许多功夫。对历史、文学、绘画、书法都下过功夫，很懂音乐，曾是清华军乐团的合格指挥；能吹小号、奏小提琴和钢琴；有一段时间对中国古代雕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打算写一本《中国雕塑史》；甚至当我迁居到东总布胡同新宅（一处四合院）时还决定在客厅的一面大墙上亲手绘一张壁画，并已画了几个星期，后来因实在挤不出时间而来而放弃了……你们不要学我什么都想搞而最后一事无成”（大意如此）。话虽这样讲，但实际上对我们影响最深的，令我们最为崇敬、向往的，还是他那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严谨的治

学态度。当然，同样令我们崇敬、向往的还有林徽因先生，她对我们的影响，除去学识之广博，文化修养之深厚之外，还要加上那令人炫目的才情。在我的青年时代有幸受到这二位大师的教诲，受到他们那种无法抗拒的魅力的感染，真令我终生深深受益。（参看拙文《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

毕业48年来，始终在清华任教。虽然在这期间完成了一些建筑设计工作，也建成了一些建筑，但我的身份始终首先是教师。因而所做大部分建筑，便或多或少加上了教学色彩。一是反映在量上。文革以前由于没有带研究生的经历，除去有三年曾参加过校内建设外，其余至多是给学生改改图或涂些不建的方案。文革十年间更是连这种心情或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从1978年以后，随着研究生教学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做设计的数量便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二是设计项目的选择性。每位研究生在学期间2~3年，初来时以学理论课为主，毕业前一年左右则要全力去写论文，剩下学设计的时间有限，为了尽可能联系实际，总要选择真实项目来做，因而在这

不长的时间里只能有什么做什么，选择不能太如意。三是关于方案的构思。将心比心，当然知道学生总希望被采纳的方案能出自自己的构思，这可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工作的主动性。因而我常证学生去草拟最初的方案，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不是有很大原则问题，总尽可能保留其基本想法，只稍加改进和润色。有的属个人性格爱好，无所谓高低，即便我自己不太喜欢的，也尽可能加以保留。当然，若遇到必须推倒重来的，或由于时间所限，不宜再长期多方案探索而须我自己提出方案者，也往往是加以暗示、引导，促其向某个方向发展，再加上动手提高改进，最后达到成熟，使他们对方案演进过程，有所领悟并自然地接受。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在完成方案设计后，即按教学计划进行论文或其他环节的工作。虽有少数人可以继续参加部分深入设计或施工图工作，但基本上工作将移到设计院去完成。无论是在本校的或外地的设计院，将有大量琐碎的后期工作仍需我的参与。这些过程，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真正源于自己

的创意的并不多。有些建成的项目，若其基本构思出自学生之手而我又未给予决定性的大改动，则在有发表的机会时，总按实际情况将学生署名在前。

有的同志说，我应该改变这种“低水平重复”的状况，集中精力搞些精品出来。但我却认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令学生有较好学习条件、为他们所接受、所欢迎，能有较多收获和提高是最重要的。而且在这过程中，亦可从这些青年的笔下，看到许多虽不成熟但很丰富和有生气的构思和想象力，对我也是一种营养。同时将自己对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通过对他们的构思的评论和如何改进的探讨，传达给他们，做到教学相长。经常涉及的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关于建筑设计中的个人风格

有一次大约是在80年代初，“青年创作小组”在武汉开会。我和几位较年长的建筑界人也应邀出席。那次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冲破各种传统束缚，探索创作中国的新建筑。其中一个话题是提倡个人风格问题，与会者大多对此表现

了强烈的要求。主持人邀我发言，我竟一时语塞。当时确实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且就我的一般倾向而言，也是不赞成太强调突出个人风格的。但这既是大家的热烈话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想一想，不能简单化。

提到个人风格，总会令人马上想到爱德华·斯通。他自从在美国驻印度使馆上用了大挑檐、新的古典构图和大面积金属花格而一炮走红之后，就成了他的个人风格中最重要的因素到处用。布鲁塞尔美国馆上满布的花格和大挑檐如果说还有代表国家因素的话，那么斯坦福大学出现那群白花格建筑，就只能说完全是为了表明设计人不是别人而是斯通。以后他在纽约的住宅外边从上到下四层楼被一整套斯通式的花格罩住，成了不必写字的个人广告。一想到这些，对于“个人风格”便会大倒胃口。其他如玛利奥·博塔、李祖原等人，无论到哪里，总是以那样一副面孔强加给城市和社会。对此，我们是否应去积极提倡、去鼓励青年建筑师设计一种自己的品牌，不论地点、条件地去推广呢？我是很怀疑的。

但是建筑作品某种程度地表现出个人风格、气质或品位，又是不能避免的。这和建筑师个人的背景、经历、文化素养等等的总和有关，而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各种影响、熏陶则更具有深刻意义。

F.L.莱特的作品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从事建筑设计60多年，建成的和停留在纸上的方案各二百多项。由于跨越了几个时期，建筑材料和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变化。他的建筑都成功地、创造性地反映了这些变化，因而具体形式均不相同。但熟悉他的人都会看出其作品始终贯串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一种“莱特风”。

贝聿铭的建筑总是在现代主义的总纲之下，根据不同内容和环境而各有创意。近20年来更可从香山饭店、香港中国银行的底层及园林小品、纽约的四季饭店和日本美惠（Miho）美术馆等看出其加强了与地方、与传统的关系。但不论是前期之简洁抽象或后期的较为复杂具象的设计创意都贯串着一种周全、文雅而细腻的气质，绝无许多现代建筑的疏野粗犷，可以说他在青少年时代所接

受的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江南一带书香门第所赋予的影响和熏陶，不是时间所能消磨掉的。中国建筑师中我们所熟悉的，前如戴念慈，现在如布正伟，也都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文如其人”，建筑也如其建筑师。

有些建筑师的作品，并不只是自然地反映其个人的文化品位，而是有意强烈地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标榜个性至上、创作自由的西方社会里，这种纯从个人出发的建筑，在一些媒体的鼓吹下，便大行其道。近年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侧翼的扩建设计中，利伯斯金将一堆歪七扭八奇形怪状的玻璃垃圾严严实实地塞进两边是严整古典建筑构成的豁口之中。我在1998年问过大英博物馆馆长和纽约图书馆馆长对此有何看法，一个是摇头叹息，一个说但愿它最终建不成。2000年我在斯坦福大学看到在斯通所设计的医学中心旁边，又扩建了一座“临床科学研究中心”，建筑师是诺曼·福斯特。60年代斯通以自己的花格、柱廊品牌放进以红瓦拱廊黄墙为标志的斯坦福校园里，而福斯特又在90年代把一大堆带有

“高科技”杆件的、他自己品牌的玻璃大盒子贴在斯通大楼的旁边，真是“一报还一报”。我问了使用此楼的亚瑟·柯思伯教授和保罗·伯格教授（都是诺贝尔奖得主）有何看法，回答都是极端否定的。他们批评建筑师对于建筑功能一无所知，却在推销大家不喜欢的形式。

当然不能从几位有影响的人的意见就得出什么结论，但我总以为建筑虽是一项艺术创作，但究竟不同于绘画或诗文，它需消耗大量社会财富并影响环境质量。因此建筑师不应该也无权把它单纯地当成为个人的艺术创作，将个人品牌形象拿来强行推销于社会。

另外，一位对社会负责任的严肃的建筑师应重视建筑的教化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更需要健康的、明朗的、具有整体感的、有秩序的建筑和建筑群体；富于文化内涵的、有时代精神的建筑形象。这些会给社会成员以鼓舞，相反的情况下，效果也相反。例如在非商业性建筑上表现过多商业化倾向，如虚伪、夸张、炫耀等，这将对社会群众的意识起到某些负面影响。

关于建筑与环境

我们初学建筑时，梁思成先生就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建筑就是体形环境。大到城市、园林，小到室内家具，建筑学就是设计环境的。这观点是令我终身受益的启蒙。

在另方面，当我开始认识事物的20世纪30年代，主要生活在北京，在四周的体形环境均笼罩在大的统一之下的老北京。每日所见总是互相穿套的四合院落、曲折的胡同、重叠的灰色院墙屋顶和墙头伸出的树，特别是在故宫、太庙、天安门附近所形成的气氛之中。那是一个同质的、统一的、有秩序、有主从的环境。作为小孩子，长期生活在这种单调的环境中当然很有兴趣于新事物。所以那时每年春天清明节将临的时候，总是盼望着一年一度的去给祖父母扫墓。那就可以在郊外住上两三天，看山、村、树、驴。但这些新刺激对意识的影响，自然远比不上每年三百多天的熏陶或者说思想的禁锢。这很可能造成以后做建筑设计时思路严谨统一有余，而活泼浪漫不足的总倾向。

西萨·佩里说，他认为建筑设计应

遵循这样的规则：总体环境重于个体建筑，个体建筑重于建筑师。我是很同意这个提法的，也符合我多年来的实践。我建成的设计散见于重庆、昆明、海口、兰州、曲阜、泰安、广州、大连、徐州及北大、清华的校园之中。这些建筑虽然大多内容相近，都属于文化教育类，但其形象之间均有较大距离，初初看去很难认为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是因为我总是希望在老环境中找到一些因素，使其成为新设计的依据，而新建筑都能较好地容于其中所致。为初学者出习作课题，常有这样的说法：将环境条件定得宽松些，以使它容易些；或索性不做规定，以便任意发挥。在设计做了几十年之后，我这“难易观”反而倒过来了。在环境极宽泛的类似“新开发区”的地方做设计，反而不知该如何落笔，倒是在有严格具体的环境条件下，容易形成合乎逻辑的具有创意的构思。在设计清华大学新图书馆时，曾有两处地段可以选择，一是放在清华东区主楼之后的中轴线上，这里地方宽阔到几乎没有限制，建筑可以搞得很“气派”，唯我独尊。二是建在老图书馆之西侧，并与之相联。这里管理集中，并可将老

校区填补完整，但建筑必然受到很大限制。二者如何选择，在使用方图书馆、建筑系教师和校领导等关心它的人中间产生了很大争论。最后确定为建于老馆之旁。校领导向我说，“这可给你出难题了”。其实我心里却想，这样才较容易，若放在另一块空地上，还真不知该如何着手。2000年春海南大学许校长邀我为该校拟一个教学楼方案。此楼位于早些年我所设计之校图书馆的斜对面。此地10年前原拟建电化教育楼一座，且已施工至首层柱顶。后因故停建，形成一群没于荒草中的断柱残垣，被称为“圆明园”。虽然拟建新楼与原电教楼之规模和内容都变了，为免浪费，校方提出应尽可能利用现有柱网，并希望新楼在风格上与对面的图书馆协调一致。许校长表示由于条件太苛、难度太大，所以才特邀千里之外的我来解决。其实这些条件反而令我的思路大为集中，无需做一些不切实际之想。此案即交给一位研究生去构思，经稍加润色即取得令海大领导满意的方案。古人云“穷而后工”。这有二解，一是说文人处于穷困，诗就写得好，二是说做诗的条件苛

了，诗就写得好。我取后者。曹丕令曹植七步题诗，讲他们兄弟，但不得有兄弟字样，这条件多苛！而也正因此写出了千古名句。做建筑设计也一样。如果条件空泛，怎么做都成，就容易出“大路货”。只有当条件具体而苛刻了，包括要和特定环境紧密关系这一条件，才容易出来有特色的设计。人们很重视“创新”，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不应总是千篇一律，没有发展变化，但“创新”不是简单地求新求奇、异想天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恰当地解决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是创造性最好的表现之一。

对环境尊重与追求和谐的理念，并不被普遍地接受。就多年来所接触到的情况看，这种追求和谐的理念常可被非建筑专家即社会一般群众所认同，相反的看法倒反而多出自建筑家（当然也不尽然）。我想这可能因为一般人更容易从直觉的美感出发看问题，而一些建筑专家则要考虑某些理论因素。20世纪处于主导地位的建筑理论是现代主义，其核心是技术和功能，而且是排他的，这就形成了不同理念之间的对立而不能相容。20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者认定自己

的理念代表了大方向，历史上的东西最终会不留痕迹地在大地上消失，那么与它们保持某种和谐对话关系显得就毫无意义了。虽然在后半个20世纪中各种思潮蜂起，现代建筑本身也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世界建筑的总趋势已走入多元化状态，但是不同理念之间的对立和互相批评，是不会停止的。开展建筑评论是正常而有益的。

中国的建筑评论活动开展得并不热烈。如果有，也多是赞扬的，碍于面子吧，批评的很少。但我有幸接受到几次较尖锐的批评。大都是关于没有“新创意”的。如说清华图书馆是“亦步亦趋”地跟着环境走，如批评北大图书馆上用了歇山大屋顶等。这些确是代表了不同的理念，即以北大而言，新馆设计于极力鼓吹和推行“夺回古都风貌”的陈希同刚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之时，建筑界正在大批大屋顶、小亭子之际，该如何处理这个建筑形象确是一个敏感问题。我以为建筑构图自有其客观规律，考虑问题不应以一时风尚为准。在此四周建筑都是传统大屋顶，而图书馆作为这一群体最终加上去的中心建筑时，在

形象上不考虑与周围建筑呼应甚至某种程度的一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在具体处理时，要在环境协调与时代精神之间找到平衡。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必须努力去面对而不能以简单化的办法处置（参见拙文《百年书城，一系文脉》）。但在它建成了几年之后，一位著名建筑评论家在谈到此北大新建筑时，以赞赏的口吻提到此群体的一些外围建筑已设计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屋顶，而图书馆的设计“又一下子把它拉了回来”，其遗憾之情犹如惋惜初见成效的戒毒者又复吸了一样。其对建筑造型求新求异的追求远胜于对环境的尊重和对建筑群要和谐统一的理念。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关于建筑和技术

现代建筑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阐明了建筑艺术和技术的关系，即建筑应尽量利用新技术以收其节省、高效之利，同时建筑应表现技术并形成以技术美为主导的审美观。这导致在20世纪多数时间中，世界上大部分地域所见到的那种明朗健康的、坦诚清晰而不矫揉造

作的、高效而节省的建筑风格。当然这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它是一套和功能、空间布局、材料技术等紧密结合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它是建筑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其影响之所及不只是整个20世纪，还将长期地继续下去。今后世界建筑正在向多元化的道路上朝不同方向发展，但现代主义的这些核心原则，将永远是其重要基础。

由于从20世纪之初起到70年代末，中国就一直在经济落后、战事频仍和在意识形态受到控制的状态下度过，中国建筑界就其整体而言，没有一段较大规模的现代建筑的实践机会，所以从未将现代主义的精神“吃透”。有的至多是个别建筑师所做的个别作品。今天西方建筑又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有的看似离开现代主义很远了，但由于他们是经过那段历史过来的，其精神许多还是一脉相承的。而在中国，建筑师们虽然在接受、模仿一些世界的新潮流，但往往是有形无实。这和我们就整体而言没有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有关。有的人提出“补课论”，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在实际上几乎不可能。我常和学生

讲，希望他们不要把太多的注意力和兴趣集中到一阵子的时尚建筑上去，重要的还是努力打好理性的基础，主要是现代主义建筑，以及中西古典。

新的技术总是推动建筑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的建筑始终是由技术在扮演主角。人们的感情总是在享受现在的同时，或怀念过去，或憧憬将来。对于将来是什么样子，最为容易想到的，就是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它给社会带来的物质变化，就是一大堆类似今天高技派建筑所组成的“未来世界”，建筑圈内和圈外的人们很容易形成对技术的无条件崇拜。在运用新技术以达到更佳功能、更舒适、更高效率和更节省的同时，也出现了为了用而用新技术，为了表现炫耀而用新技术……的倾向，以致有许多时候因此而大大提高了造价和运行费用，完全违背了运用新技术的初衷；或者在技术经济尚未达到必要的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里，出于对新技术形象的盲目追求，勉强以传统技术手段去模拟新技术的形象，既达不到好的效果，也不合现代主义艺术与技术有机结合的原则，为有识者所不取，真是一无是处。

对于技术，有论者说：“一方面，人类的力量（指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增长，但是如何运用这种力量的智慧却没有增长，这就使得人类的未来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变数。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核战的阴云、前途未卜的信息技术和基因技术……人类正遭受着自己的强有力的挑战……。”在建筑业，像是人类社会的缩影，缺乏如何正确地有节制地使用这种能力的智慧。在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宪章》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正以其一个刃为人类披荆斩棘，开辟通往未来之路；另一个刃却在伤害着人类自己……”

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建筑史上曾有过类似的过程。在约600多年前的中世纪之末，建筑技术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时所产生的哥特式风格开始转入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取代了神权文化，技术在建筑中的突出位置让位于技术、艺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提高；瘦骨嶙峋的哥特建筑让位于富于人情的、明朗优美的文艺复兴建筑。这是建筑史上伟大的一页。

在建筑设计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度。要全面地提高，而不应只突出一个方面、强调一个因素。要把技术进步对建筑的贡献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像绝大多数普通人所自然认识的那样，而非少数建筑师所表现出来的偏见。

1992年美国《建筑记录》杂志所公布的一份读者意见（大体可认为兼具业内外人士之代表性）显示，对“20世纪最重要的百项建筑”的选择排序中，流水别墅名列第一。在145座入选建筑中，莱特的作品共12项，为个人入选作品最多的，多于排第二的柯布西埃（7项）近一倍。其他入选较多的为密斯·凡·德·罗和路易·康，都是5项。当然在这百年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应推密斯。著名记者汤姆·沃尔夫称他“把半个美国放进了玻璃盒子”。这是单纯追求技术、表现技术的结果。然而到了世纪之末，人们冷静下来全面回顾之后，就不止是着重一时的时尚而更多地看重建筑的全面价值。流水别墅一方面表现了当时（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一种新材料——钢筋混凝土，同时极大地塑造